

文明交往、国家构建与埃及发展

毕健康

内容提要 埃及是地中海世界和地中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具有大开放特征。埃及伊斯兰教化与阿拉伯化后，曾在中古时代一度辉煌，随后严重滞后于地中海北岸的资本主义文明。强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同，有益于埃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未来的大发展。从文明交往的横向维度和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探讨埃及的国家构建与发展问题，则为人们思考当前的中东变局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国家构建 埃及 地中海文明 伊斯兰文明 资本主义文明

作者简介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当前正在进一步延烧之中的中东变局，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学术兴趣。这场变革的根本原因、严重影响与发展前景，成为学术探讨的焦点。^① 不过，“超越变局看变局”，即从长时段、大历史视野审视和探究这场变局，或许可以为我们反思中东国家的过去，管窥其未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我们以埃及为个案，探讨埃及与地中海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性交往，研究埃及国家构建，透视埃及发展问题。

^① 例如，《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推出专栏“透析中东动荡的原因与影响”，发表王京烈的《解读中东政治危机》，李伟建的《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安维华的《埃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探析》，戴晓琦的《19世纪以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及其对当前社会的影响》，张春宇、唐军的《中东政局动荡的经济影响》，以及蒋灏的《试析当代埃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和第5期推出2组专栏文章“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上、中）。

文明交往中的埃及

人们观察、思考人类历史发展，无非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的维度，即历史上各种人类共同体（部落、部族、民族、国家）的交往，亦即文明交往。人类的大趋势，是从分散、孤立走向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进而步入一体化与全球化时代。从小国寡民的部落、部落联盟、城邦到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就是文明交往、历史发展的产物。^①孤立的文明，唯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否则，文明很可能陷入衰落甚至灭绝的境地。正如彭树智先生所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②纵向的维度，即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聚焦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步，具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当然，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其中充满坎坷和曲折。而且，社会变革、历史进步与文明交往密切相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大势，更是人们相互交往、文明碰撞与互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历史，提供了指导和借鉴。^③

埃及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交汇处，历史久远，文化灿烂，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从埃及挥师西征，进入利比亚（古代利比亚文化圈覆盖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地区，即今日的马格里布地区——阿拉伯世界的西方），并可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从而与欧洲直接交往。往南则进入努比亚，埃及与努比亚相互征讨，文化与历史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往东则挥师地中海东岸的大巴勒斯坦地区，与两河流域文明直接碰撞，直至冲击小亚细亚。往北，越过蔚蓝色的地中海，可以克里特岛为跳板，与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

①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高度重视人类历史的横向联系，认为世界历史的内容就是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吴于廑著：《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② 参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可参见何顺果著：《世界历史：马克思的概念及其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第4~14页。

（一）埃及与地中海文明

在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具有特殊性的地区。一个是广袤无边的中亚大草原，一个是蔚蓝色的地中海。中亚大草原任人驰骋，是游牧民族征伐农耕民族的舞台，因而成为文明碰撞、文明交往最典型的区域。

如果说中亚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策马驰骋的天堂、大陆文明的交汇处，那么地中海则是海洋文明的摇篮。

地中海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联结和沟通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内湖乃至“盆地”。地中海东西长4 000公里，南北最宽处1 800公里，面积约25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22 530公里。地中海东西南北交通便利，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仅13公里。西西里岛距意大利南端非常近，离突尼斯仅200余公里。地中海既是阻隔人类交往的障碍，令人望洋兴叹，又是方便人们交往的坦途，以及文明交往的大舞台。

地中海这片神奇的内海，孕育出三大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见证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与发展。地中海南岸，尼罗河流域滋养出辉煌的文明。公元前3400年，埃及出现象形文字。大约300年后，上埃及和下埃及就出现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法老时代开始。巍峨耸立的金字塔，默默无言地书写出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埃及文明的辉煌。新王国时期（前1567～前1085年），古代埃及的文治武功达到巅峰，神庙建筑突飞猛进。卢克索神庙就是新王国时期埃及留给后人最具震撼力的划时代作品。卡纳克神庙始建于古王国时期，竣工于托勒密时期（前305～前30年），持续近2 000年，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建筑之一。^①

在地中海东岸，比布鲁斯（“Byblos”，今贝鲁特以北15英里）在旧石器时代建成。公元前3000年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出现真正的文明。公元前1800～前1500年，赫梯发展成为帝国。埃及法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赫梯国王。赫梯人以贸易致富，发展成地区性大国。公元前13世纪消亡。

在地中海东部，介于埃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克里特岛，当埃及开始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克里特人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米诺斯文明或克里特

^① 参见彭树智主编；雷钰、苏瑞林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9～92页。

文明。公元前 2000 年，克里特岛成为东地中海的商业枢纽，克诺索斯（Knossos）和费斯托斯（Phaestos）这两座伟大的宫殿迅速建成。克诺索斯宫殿群蔚为壮观。修昔底德认为，米诺斯建立了地中海第一支伟大的海军。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文明对整个东地中海都产生了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远远扩展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多瑙河地区，撒丁岛（Sardinia）以及西西里岛东北沿海之外的伊奥利亚（Aeolian）群岛”。^① 克里特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承接着克里特文明。迈锡尼人很可能与埃及第 18 王朝（公元前 1567 ~ 前 1320 年）发生直接交往。公元前 14 世纪，迈锡尼文明发展到巅峰，其对外贸易甚至远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公元前 13 世纪，庞大的迈锡尼军队远征小亚细亚，这大概就是家喻户晓的特洛伊战争。盛极而衰，约公元前 1100 年，迈锡尼文明灰飞烟灭。

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是连接古代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桥梁，犹太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古王国时代，埃及法老文献提到其在迦南的商业利益。公元前 18 世纪下半叶，中王国（公元前 1991 ~ 前 1786 年）末期埃及四分五裂，喜克索斯人乘机从迦南涌入尼罗河三角洲，建立第 15 王朝和第 16 王朝。迦南发生旱灾和饥荒，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随喜克索斯人进入埃及。在特洛伊战争后不久，希伯来人不堪埃及法老的压迫和剥削，在摩西的带领下重返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出埃及之旅备尝艰辛，在西奈半岛出现神迹，摩西假借耶和华之命，与族人订立《摩西十戒》，为犹太教奠定基础。^②

迈锡尼文明泯灭后，腓尼基文明及其殖民地迦太基强势崛起，再度书写地中海文明的辉煌。腓尼基人的疆域，是黎巴嫩山脉和地中海之间的狭窄地带和靠近海岸的岛屿。较大的商业中心有推罗、西顿和贝鲁特。公元前 10 世纪到前 8 世纪，腓尼基文明达到鼎盛阶段。腓尼基人以“和平的”贸易建立起在地中海的霸权。公元前 11 世纪开始向爱琴海外扩张，到公元前 9 世纪末，他们已经抵达地中海西部，并且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

^① 参见 [英国]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殷亚平等译：《地中海史》，中国出版集团，2011 年中文版，上册，第 9 页。

^② 汝信总主编；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 页。

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甚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①

腓尼基人以商立国，以海为家，在地中海世界广泛建立殖民地。腓尼基人最早的殖民地于今天北非的突尼斯和西班牙的加迪斯。公元前800年前后，他们在今日的突尼斯城附近建立迦太基城。迦太基后来居上，其光辉远在母国之上。公元前500年左右，迦太基意欲成为庞大的腓尼基帝国的国都，企图垄断地中海贸易，先后与希腊城市和罗马发生大规模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挥师直捣罗马本土。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摧毁迦太基城，腓尼基文明泯灭。

大致说来，公元前6世纪以来，地中海南岸和东岸文明开始走下坡路，而北岸则异军突起，这就是先后相继的希腊古典文明和罗马文明。无论希（腊）波（斯）战争，还是罗马帝国的南征北战；无论雅典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奴隶制直接民主与灿烂的文化，抑或罗马共和国之混合政体与罗马帝国的伟业，都将地中海文明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峰。同时，凸显出地中海文明的海洋特色与开放性。所谓地中海文明，大抵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罗马帝国将其推向巅峰。地中海南岸、东岸和北岸，以及地中海中部的克里特岛，各种文明此起彼伏，相互碰撞，交往激荡。地中海成为各文明交往的通衢大道。各文明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建立商业据点、殖民地或大帝国，充分展示出各文明的横向交往与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持续数百年的希腊化运动，既是文明交往的典范和历史横向联系的典型，又推动了地中海世界的纵向发展与历史的进步，使熠熠生辉的希腊古典文明发扬光大，又为罗马帝国治下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埃及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与地中海诸文明的碰撞与交往，铸就了埃及文明的特性，是埃及国家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明交往，从来就有和平与暴力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密不可分，相互转化。法老时代的埃及3000年历史中，埃及文明曾领跑地中海世界，甚至可以说领跑全世界。

埃及文明与地中海诸文明的密切交往，体现出埃及自古以来的开放性。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埃及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

^① [美国]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中文版，第1卷，第135页。[美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上卷，第88页。

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① 此言差矣！无论沙漠，还是海洋，均阻止不住军马驰骋的铁蹄和商人逐利的脚步。埃及文明的辉煌，甚至埃及对地中海文明的伟大贡献，^② 恰恰就是法老时代埃及的帝国伟业。埃及大帝国的建立拓展了埃及文明。反之，一旦埃及衰败，便门户洞开，成为地中海和中东霸权大国角逐的场所。

埃及与其他地中海文明的交往，呈现出明显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态势。总体上看，埃及先强后弱，在新王国时期大帝国的巅峰之后逐渐走向衰败，在以后的3 000多年中再也没有恢复这样的帝国伟业。从文明交往的视角看，有几点似乎值得书写。首先，埃及在地中海世界建立起极为广泛的贸易网络。比布鲁斯港口是埃及与黎凡特贸易的枢纽，埃及由此获得上好的木材。南面的努比亚，既是埃及殖民的对象，又是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古王国上埃及的统治者哈尔胡夫4次探险努比亚，凸显埃及与努比亚的密切关系。埃及人从红海沿岸神秘的蓬特（可能位于今日的索马里）购买香料和没药。早在中王国时期，埃及人就与北面的克里特岛等爱琴海诸岛居民进行跨文化交流，新王国时期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在国力渐衰的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89～前525年），普撒美提克一世（公元前664～前610年，第26王朝建立者）与其继任者尼克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开始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修建运河，“并建立了一支三层浆战舰的舰队。他雇佣了腓尼基水手绕非洲航行三年”。^③

其次，埃及对地中海诸文明的大开放格局。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并建立自己的王朝，对埃及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接受新的战争技术与各种革新，如马和马车，建立专门的海上军队。埃及使用非本土的人力资源，比如使用

① [美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卷，第64页。

② 马丁·贝尔纳提出，公元前21世纪，第11王朝期间埃及攻击黎凡特，对克里特甚至希腊本土产生重大影响。“克里特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王国的兴起。”他认为，这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期。“公元前15世纪中期，第18王朝在黎凡特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并接受爱琴海地区的朝贡。”参见马丁·贝尔纳著；郝田虎、程英译：《黑色亚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中文版，第14～16页。

③ [英国] 罗莎利·戴维著；李晓东译：《探寻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文版，第403～419页，第133页。

希腊雇佣兵、腓尼基水手等。第26王朝期间(公元前664~前525年),希腊商人就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建立自己的大型贸易城市,成为事实上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大帝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发展成为地中海商业、文化、宗教中心,是埃及大开放与地中海诸文明大交往的典范和物证。

再次,在地中海文明交往中,宗教具有重大意义,而埃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出现于埃赫拉吞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353~前1335年)的阿玛纳宗教,可能对犹太-基督教产生重要影响。^①喜克索斯人入侵、统治埃及与败退埃及,很可能是《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的原型。埃及(尤其是西奈半岛)为犹太教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情结和舞台。据研究,《阿蒙霍特普教谕》与《圣经·箴言》在风格和内容上有相似之处,前者形成于拉美西斯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此时正值埃及对以色列影响的高峰期。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就可能通过亚历山大传入埃及,受到埃及百姓的欢迎,埃及开始进入基督教时代。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与发展历经曲折。二世纪末,基督教在亚历山大和下埃及获得重要进展。四世纪末,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使基督教在埃及和整个地中海世界迅速发展。然而,在451年的卡尔西顿公会议上,埃及神职人员拒绝耶稣兼具神性和人性的教义,埃及教会与其余基督教教派决裂,自成一体,曰科普特教。科普特语、科普特人与科普特教一体化,此即埃及之科普特时期,直至7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入据埃及。

(二) 埃及与伊斯兰文明

7世纪初年,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和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对广袤无垠的亚、非、欧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便在伊斯兰教的激励与利益刺激下,冲出半岛,实行大扩张。西北方向,635年夺取历史名城大马士革。3年后攻占耶路撒冷,从此耶路撒冷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东北方向,也是638年,攻陷波斯萨珊王朝首都泰息丰,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大部。711年攻入印度河流域。阿拉伯人乘胜西征,642年占领埃及首府亚历山大,随即占领埃及大部。阿拉伯军队势如破竹,挥师西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马格里布。711~712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714

^① 参见郭丹彤著:《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160页。

年占领西班牙，732年推进到法国中部。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悄然崛起。

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埃及和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伊斯兰化，是埃及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大规模、多轮次向埃及和马格里布移民。对埃及的移民，从7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例如，663年埃及总督阿慕尔临死前，半岛北方部族带着家属，一次前往埃及12 000人，当时驻守埃及的阿拉伯军队，连同家属，达40 000人。^①在移民与阿拉伯人直接统治下，埃及用了大约三四个世纪的时间，先后完成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到9世纪初，阿拉伯语文已经在埃及人民中普遍使用。埃及基本完成了从科普特—基督教文明向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转换。

科普特—基督教文明的逐渐边缘化，埃及的人种（血缘或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发生根本变化，凸显埃及柔韧的适应性与强大的开放性。埃及历史与文明的包容性，恰恰是横向的文明交往的产物。这种横向的文明交往反过来促进历史发展与文明的新生。从地中海文明的纵向发展来看，出现了新的态势。在地中海北岸，在罗马帝国衰败过程中，随着日耳曼人等蛮族的入侵，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已成历史记忆，中世纪封建欧洲黯然失色。唯有在欧洲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在阿拉伯人的经营下蒸蒸日上，发展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

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地中海南岸和北岸文明态势逆转，南强北弱，埃及再度崛起。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909～1171年）最初由什叶派在凯鲁万城（今突尼斯东南）建立，得到柏柏尔人支持，几乎囊括整个北非。乃挥师东向，969年进攻埃及，建立新都开罗。在法蒂玛王朝治下，埃及工商业和城市相当发达，是地中海世界最强盛的国家。“11世纪初，拜占庭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已经日趋衰微。法蒂玛人为了垄断地中海的贸易，着手修理和扩充亚历山大和迪木雅特两个港口，建造军舰商船600只，行驶于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海外贸易的活动，直达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红海沿岸和印度，和当时新兴的威尼斯相抗衡。并专设‘海外贸易部’，经营管理航务和税务。”^②

国力的强盛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强劲的支持。11世纪是法蒂玛王朝文化

① 纳忠著：《论中世纪埃及阿拉伯移民的变迁》，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页。

② 纳忠著：《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高度发展的时期。建于972年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发展成为一所伊斯兰大学，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大学免费提供食宿和书籍，吸引大批著名学者讲学和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苦读钻研。在整个古典伊斯兰教时期，埃及大师云集，英才辈出，宗教学者、诗人和历史学家宛若明星。开罗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跃成为伊斯兰教文化的发源地，甚至使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和后倭马亚王朝的科尔多瓦黯然失色。

埃及的再度辉煌，谱写了地中海文明大开放、大交往的新篇章。早在半独立的突伦王朝（869~905年）时期，埃及的帝国情结就再度萌发，挺进叙利亚，疆域东起伊拉克，西达利比亚，北接小亚细亚，南抵努比亚。

11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两个多世纪里，欧亚大陆和地中海世界风起云涌，马蹄声急。在地中海盆地西端和北岸，西欧封建君主与新兴的市民阶层，垂涎富庶的东方伊斯兰教世界，意欲与阿拉伯商人和拜占庭帝国争夺东地中海和西亚的港口与市场，乃与罗马教皇联手，以圣战名义，发动8次十字军东征（始于1096/1097年之交，止于1270年前后）。正是在抵抗十字军东侵之中，库尔德人（一说突厥人）萨拉丁在埃及建立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战功赫赫，成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在西亚，11世纪上半叶，阿拔斯帝国已经走上了颓废衰落的不归路，大帝国徒具虚名，蒙古帝国正强势崛起。1258年2月10日，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阿巴斯帝国灭亡。埃及再次肩负抵抗蒙古人入侵的使命。1260年9月，埃及与蒙古人在今约旦境内的艾因·扎鲁特一决雌雄，埃及大获全胜，叙利亚再归埃及。1281年，埃及素丹盖拉温（1279~1290年在位）在霍姆斯击败帖木儿。1303年，埃及素丹纳绥尔（1293~1294年，1298~1308年在位）率军在大马士革以南32公里处的苏法尔草原击败蒙古军。从此，蒙古军再无力侵犯埃及，非洲大陆免遭兵燹之灾。

埃及的国家构建与发展问题

然而，十字军东征以来，地中海文明的强弱态势再度逆转。这是我们认识埃及国家构建与发展问题最为现实与直接的关键节点。

在地中海北岸，在黑暗而落后的欧洲封建社会躯体上，渐渐萌生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14~15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尼德兰，

一些大城市开始萌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欧洲生产力发展尤其是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伴随着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野蛮掠夺。野蛮的“原始积累”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以牟利为不竭的动力，以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机制，源源不断地赚取利润。资本主义的法则很简单：利润或死亡。资本家永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革命和组织管理的革新，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资本主义为欧洲及西方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为了赚取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殖民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促进了文明的全球性交往，开启了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的政治枷锁与对人们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文艺复兴发端于意大利，迅速传遍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人道，反对“神道”；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延伸。马丁·路德（1483～1546年）以信仰为核心的主张是革命性的，因为教会（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不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必要中介，从宗教本源上否定了基督教会优越于国家的权威。否定宗教仪式的重要性，使人从中解放出来，追求此岸世界的幸福、成就与财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海外扩张运动。

伴随宗教改革的血腥的宗教战争和基督教的再次分裂，促使各教派不得不逐渐接受教派多元，履行宗教宽容。“宗教改革直接和决定性的遗产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转移，”^②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创造了前提。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为世俗国家结束频繁的封建战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卷，第277页。

② [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卷，第384～385页。

争，废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市场、关税和法制，是新生的市民阶层（后来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必要条件。于是，市民阶层与世俗国家的君主结成非正式的联盟，结束封建统治和教会国家，构建世俗的民族国家。

正当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时，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在经历一度的辉煌后一落千丈，陨落不振。埃及的衰落，与马木鲁克王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奥斯曼帝国治下埃及的边缘化不无关系，又是国际贸易大通道转移的结果。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造成地中海贸易的迅速衰败，工商业曾一度兴盛的意大利和控制红海—地中海贸易通道的埃及都先后衰落。意大利四分五裂，埃及在奥斯曼帝国的名义统治下经济凋敝，失去了“粮仓”地位，人口下降。政治上，马木鲁克东山再起，与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帕夏争权夺利，政治混乱。在这样的起点上，埃及的国家构建之路必然坎坷曲折。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于形而下的经济体系之中，其本能和内在冲动是资本的增殖与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资本权力的扩张既摧毁了封建旧制度，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近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逐渐建立、演变和发展，又将上帝挤回彼岸世界，国家与宗教分离，现代世俗民族国家诞生了。在国际层面，资本的扩张注定在科技、工业、军事和制度上占有明显优势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侵略，促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性传播。

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积贫积弱的埃及如何应对欧洲的殖民侵略？如何应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严峻挑战？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埃及经历了主动变革、被动应对再到主动发展的曲折过程。在1798~1801年拿破仑入侵后的混乱中，阿尔巴利亚烟草商人穆罕默德·阿里乘势崛起，1805年出任埃及总督，两年后巩固自己的统治。阿里以埃及为自己的家园，以复兴埃及为己任，维新图强，实行欧化改革，使埃及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面貌一新，甚至一度使埃及的势力扩张到苏丹（努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基里基里亚和克里特岛，不禁让人回想起法老时代跨越亚洲和非洲的埃及帝国。然而，1840年《伦敦条约》把阿里的帝国梦扼杀在摇篮之中。阿里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伊斯梅尔（1863~1879年执政）心仪欧洲文明，继续欧化改革，结果反而套上了英法资本的枷锁。1882年，英军入侵埃及，埃及失去了主动改革、推进资本主义

发展的机会。1922年，英国发表“二·二八”声明，埃及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依然没有摆脱英国的殖民枷锁。1952年七月革命胜利后，埃及恢复独立，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在两个世纪的历程中，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外部势力的强力干预，十分曲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埃及经济畸形发展，被动卷入世界经济的大波动之中。1952年以来，埃及在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但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无论萨达特的开放政策，还是穆巴拉克比较稳健的改革与发展政策，成效都有限。

埃及的发展问题，最终要追究到埃及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磨合上来。质言之，就是伊斯兰教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交往、碰撞与调试问题。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是货币经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经济的货币化加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基督教会放弃对利息的谴责，利益与风险分担的新机制合股公司成为资本主义运行与扩张的工具。在这方面，伊斯兰教没有根本突破，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

对埃及发展的制约，当然还体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必须建立在此岸世界和人本主义基础上。一切归于真主，宗教高于国家，神权先于和优于政权、人权，这是一切伊斯兰教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与深思的难题。相对而言，埃及民族国家的构建比较顺利。穆罕默德·阿里以军功起家，奠定了埃及作为世俗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埃及的宗教问题依然严重。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宗派纷争，至今仍未停息。

其实，埃及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往的大舞台，作为一个国家埃及的开放性引人瞩目。埃及的希腊化就是埃及敞开胸襟，接受外来文明最典型的事例。埃及人津津乐道、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英雄萨拉丁也是外族人（库尔德人或突厥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穆罕默德·阿里同样不是“埃及人”，甚至也不是阿拉伯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埃及再度大开放、接受资本主义文明？

从642年阿拉伯人入据埃及，迄今1300余年。埃及完成伊斯兰教化至少1000年。阿拉伯人向埃及移民，而且进入乡村，与当时的土著混居、通婚，使埃及从血缘和宗教上彻底改变。可以说，伊斯兰教进入了埃及人的血液之中。伊斯兰教在神学或教义层次上，依然故我，致使埃及的世俗化很不彻底，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错综复杂。

世俗民族国家是通达现代的必由之路。埃及作为伊斯兰教世界的核心地区和文化强国,在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国家的融合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与改革、英国的殖民统治,均有助于埃及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中,埃及是比较典型的世俗国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埃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埃及开明思想家力图调和国家与宗教、科学与信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比如,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自然与人类,一切事物均归宗于真主的前提下,把主权划分为原生主权和次生主权。原生主权归于真主,次生主权归于人民,从而调和伊斯兰教之真主主权与人民主权的矛盾。然而,在人本与神本、人权与神权问题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埃及世俗化的不彻底。国家建制的世俗化与社会的宗教性二元并存,社会的宗教性抑制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发展。

开放性是埃及历史的主旋律。埃及原本就是地中海世界和地中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埃及在某种程度上本来就存在二元身份认同,即对伊斯兰教文明的认同和对地中海文明的认同,这是穆罕默德·阿里王朝欧化改革的现实基础。强化对地中海文明(在当下,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同,有益于埃及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在现代世俗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民主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无疑有利于埃及的发展。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昨天的延续。回首中东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曾经发生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奥斯曼帝国衰败,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与瓜分广大中东地区。第二次是殖民势力败退中东,中东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当前发生的重大变局,则是中东国家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空与历史坐标上,思考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管窥未来走势,我们尝试归纳出“三为”,供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现代为道。道者,路也,道路也,大势也。现代化是一切国家必然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可回避,不可逆转。中东伊斯兰国家,不管曾经经历多么坎坷不平的现代化历程,依然必须坚持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埃及如欲实现复兴,恢复地区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就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进现代化进程。第二,民生为本。本者,根也,本旨也。回顾中东国家的发展,两个不平衡相当突出。一是产油国与贫油国之间、阿拉伯兄弟国家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二是各国内部地区发展、国民收入的分配很不平衡,甚至严重失衡。发展不

平衡是经济的普遍规律，然而极度失衡不仅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乃至政治动乱，而且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公平原则，当然也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与宗旨。唯有实现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切实改善民生，使绝大多数人口分享和感受到发展的果实，才能变乱为治，民富国强。第三，民主为体。体者，用也，体制也。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切实改善民生，政治权力就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中东国家在民主发展上亦很不平衡，具有明显的梯级化特征。土耳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摸索，构建出基本适应本国国情与发展水平的民主政治体制。穆巴拉克政权的倾覆，其导火索便是穆巴拉克“父传子”的“司马昭之心”。这个教训是深刻的，逐步构建适合自身国情的民主政治，有利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有利于实现人自身的自由与发展。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Nation - Buil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in Egypt

Bi Jianka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s, Egypt has been showing great openness from ancient times. After Islamization and Arabization, Egypt reached its heyday during the Middle Ages before lagging far behind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t the north bank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will be helpful to modern nation - building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Egypt. The study of nation -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issues in Egyp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changes of civilization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s will provide people with new angles to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Nation - Building; Egyp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Islamic Civilizatio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